

梁啟超來台前後

陳與公

民國前一年（辛亥）春三月，梁啟超任公偕其女公子會嫻及湯覺頓由日本神戶來台。此行在他本人風雲變幻、波瀾起伏的生涯中，並不算什麼一回事，但是在台灣這個海上孤島的小天地裏，却發生了重大的作用，不失為石破天驚的大事件。

林獻堂戲劇性初訪

台灣父老知道梁啟超的大名，無疑是戊戌政變以後的事。當時康（有為）梁名聲傳遍遐邇，認識任公的人可能不少，但是台籍人士和他接觸最早的却是林獻堂。他們初次的面面頗富於戲劇性，不但對於林獻堂個人的思想行動有重大的影響，對於台灣民族運動也發生決定性的作用。

林獻堂平時就是清議報、新民叢報（均係任公亡命日本時先後發刊的雜誌）的愛讀者，民國前五年他初次漫遊日本，秋間由東京啟程返台，當時任公常住神戶。當林獻堂在離東京之前，先到橫濱大同學院，探詢任公的行踪，但不得要領，說須到神戶問湯覺頓才能够明白。於是林獻堂便借甘得中（彰化人，當時任林獻堂祕書）束裝就道，打算沿路觀光，待到神戶時找湯覺頓打聽

。當他們旅次日本古都奈良時，甘氏無意中翻閱旅舍住客名冊，發現有三個中國人姓名，一個潘博，一個陳宮笙，另一個應該是任公的假名，陳宮笙係新民叢報發行人，甘得中當時便想到若詢問陳氏或可獲悉任公現在何處。於是馬上跑上三樓，先找一個下女問訊，並叫那下女帶他去見姓陳的住客，下女說他們在某號房間，叫甘得中自己去找好了。因為下女不肯帶路，甘氏發脾氣，正在吵鬧的當兒，一個客人拉開紙門出來問：「什麼事？」甘氏乃捨去下女向那人說：「我們是由台灣來的，久仰梁啟超先生大名，甚願有機會能見他一面，因為貴客之中有一個陳先生，想要請問他不知道梁先生現住那裏。」那人起先有些惶惑的樣子，後來笑容可掬地說：「我就是梁啟超，請到裏面坐坐。」甘氏一聞此言，喜出望外，真有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」的感覺，就說：「且慢，我們還有一個朋友要見你，待我到下面，請他同來拜謁」，於是這一次的會面，就在任公的住室展開。

一番筆談影響深遠

先是由甘氏用不甚純熟的北京官話翻譯，但

因不能够暢所欲言，乃改用筆談。任公寫道：「本是同根，今成異國，滄桑之感，諒有同情……今夕之遇，誠非偶然。」因為任公的文字委婉動人，又充滿情感，林獻堂和甘得中大受感動，幾至於掉下眼淚來，可惜全文都已忘記。以上是甘得中於光復後對友人述說的，因為甘氏平素極端傾倒於任公的道德文章，所以那一天的情形印象深刻，所談的情景和事實可能無大出入。

林獻堂就台胞爭取自由的問題，向任公有所請教，任公說：「中國在今後三十年中，斷沒有能力幫助台胞爭取自由，台胞切不可輕舉妄動而有無謂的犧牲。最好做效愛爾蘭人對付英國的手段，厚結日本中央政界的顯要，以牽制台灣總督府的政治，使其不敢過份壓迫台人。」是夕的晤談，大有水乳交融的樂趣，林獻堂所得印象甚深，尤其最後一段話，乃是奠定台灣省民族運動的方針，不但林獻堂認為對，而台省的民族運動所以會採取溫和的路線，雖說是歷史的教訓（割台後台人為反抗日本統治實行武裝反抗，峰起多次，但均為日本的武力所消滅）和時代的環境逼使它不得不如此。但是任公這一夕話却很有分量，確實給與抗日運動的領袖人物以重大而又切實的

啓示，無疑地也是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。

希望勿以文人終身

林獻堂於離日之前，敦請任公來台一遊，並囑他於來台之前，最好能够獲得日本政界顯要的介绍書函，以免受到警察的刁難。獻堂的邀請和建議，當然得到任公的接受。其後四年，終有任公台灣之行的實現。

任公一行於辛亥年（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）

二月二十八日來到台灣，林獻堂偕父老十數輩到基隆碼頭迎迓，他們在台北滯留五天，第六天才同獻堂到霧峯，作林家萊園的上賓。任公到霧峯的第二天，諄諄勸告林獻堂及林幼春（獻堂姪），叫他們不可以「文人終身」，必須努力研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思想等學問。同時舉筆開列日本書籍三十餘種，以後又陸續增列，計達一百七十餘種，都是東西方的名著，任公又把他自己所發明的一套「日文拾讀法」，耳提面命地傳授林獻堂和林幼春。那套拾讀法據說是拾讀日本文中的漢字，而對日文「假名」字和漢文的組織予以公式化，以判斷其文意是否定還是肯定。此種方法僅可適用於所謂「漢文調」的日文，對於口語體的日文就行不通了，聽說任公自己後來也認錯了。

任公此行留台前後十餘日，住在霧峯萊園僅有四天工夫，但是他的聲、光、魔力，在此間發生難以計量的影響。尤其是對於林獻堂個人的影響特別大。獻堂的國家民族觀念，說是由任公予以開眼也無不可。當然獻堂應不是沒有祖國觀念

的人，也不是沒有志氣的人，不過在未接觸任公之前，以年齡（當時獻堂三十七歲）以環境（大少爺）來講，他的思想可能還在暗中摸索的階段，至少任公的影響，是有使他豁然貫通的作用的。

報難兄弟自相親

民國前四年，正是割台後滿十七年，在這期間，台灣的知識階層，對祖國的文化潮流、思想傾向，除一小部份的進步份子，平時購讀國內報刊雜誌而得一點概念外，因為日本人的規制森嚴，幾乎無法接觸。日本人所授的教育，祇是教授語言而已，根本與思想文化無關，這悠悠十七年間可以說是台灣文化的空白時期。一般父老除抱殘守缺，誦讀四書五經外，幾乎不知道世間還有思想與學問可供探討。其次在這十七年間，受異族的欺凌壓迫，悶在胸中的一股惡氣，無處宣洩，一股孺慕祖國、熱愛民族的丹心無處寄託，那種悲憤無奈的心情，是不難想像的。莫怪任公在台北東蒼芳旗亭，受父老百餘人開會歡迎，席上所發表的四首律詩，曾震動一時，不脛而走，傳遍全台各個角落。至今仍有些父老能琅琅上口，一字不忘者。詩中有：

「萬死一詢諸父老，豈緣漢節始沾衣」，「破碎山河誰料得，報難兄弟自相親」之句，這都是抓到父老內心的癢處，而且是極有分量的文字。台灣詩人林痴仙（林獻堂的堂兄）贈任公的詩中有「披雲見青天，慰我饑腸渴」正是道破一般父老的心情。總而言之，任公此

行對於當時的台灣這一窪止水，投下一個石頭，使它發生漣漪，對台人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予以鼓勵，加強其對祖國的向心力。對於思想學問方面則有開通風氣、震聳發聵的效果。

據甘得中當年對友人說：自任公來台以後，一般年青人在其談話中，「理想」、「現實」、「目的」、「手段」這一類名詞就逐漸出現，這無疑是受任公的影響。

林獻堂曾規勸任公

最後，來說林獻堂和梁任公的交情。獻堂自民前五年與任公訂交以來，即常有書信往來，任公有一長篇七古題為「贈台灣逸民林獻堂兼簡其從子幼春」，詩中有：

「丈夫未死未可料，萬一還能振物體」

「以前昂君還自繩，君當收涕啓梁齒，河梁十月水清淺，霧峯遠接蓬萊紫」，期許之深可以想見。民前五年十二月廿九日任公致徐復蘇信中，就已提及獻堂，信中有「尚有台灣林君者，亦熱心故國，而崇拜吾黨」云云。不過「崇拜吾黨」一句乃係任公的謙詞，事實上獻堂和其姪幼春等，對於任公的道德文章，固是五體投地，但是對任公所搞的「保皇黨」，却不以為然。當民國元年九月任公將由日本歸國的時候，曾致電幼春，囑其向獻堂告貸千圓以充旅費，獻堂如數匯去，並由幼春作書，極力勸其與國民黨合作，而反對他去當袁世凱的財政總長，可見他們的交情並非泛泛者可比。